

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评估报告



2019 年 4 月 25 日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010-8567969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

邮箱：lianhe@lhratings.com

传真：010-85679228

PICC 大厦 17 层

网 址：www.lhratings.com

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评价报告¹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主权部

摘要

继 2017 年中国首次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今年 4 月 25 日中国又迎来了第二届高峰论坛的召开。近年来，国内债务资本市场支持“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环境逐渐成熟，国内债市双向开放程度加深为国内投资者提供了更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投资环境、优化能源结构等刚性需求较大，近年来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尤其是在能源、铁路、公路、港口、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但同时，从境外的情况看，“一带一路”建设涉及 60 余个²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周边市场，部分沿线国家政治风险尤为显著，政治风险因具有“难以控制、难以制止”的特性，且影响力大、辐射面广，往往对各类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潜在损失。因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风险的程度进行界定、分析和量化评估，对于金融投资者以及企业投资决策而言，均将提供关联性较强的指导。

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主要因素的分析，建立了以政局稳定性、政府治理、社会安全、政府管制和地缘政治五大因素为框架的政治风险评价体系，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程度进行评估，绘制了“一带一路”沿线 50 个重点国家的政治风险地图。同时，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独联体、亚太、中东北非、东欧四个地区，结合地区重点国家情况对其政治风险进行了归纳和解读。

从政治风险评价结果看，“一带一路”四大地区中，独联体地区政治风险最为显著，区域中包括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中亚五国等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较高，政局稳定性和政府治理等风险也相对突出。亚太地区政治风险呈现一定的分化趋势，新加坡政治风险很低，而南亚的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政治风险则均处于很高区间。中东北非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突出，社会安全环境较差。东欧地区政治风险整体较低，除巴尔干半岛部分国家外，东欧地区大多数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高，各国执政党普遍拥有亲商、开放的政策共识，在经济增长向好的背景下，社会安全及地缘政治稳定性显著优于其他地区。

¹ 本报告中观点、结论仅供参考。本报告内容亦并非就任何个别投资者的特定投资目标及个别需要而编制。投资者不应只按本文结论进行投资。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前，投资者应考虑产品的特点、其本身的投资目标、可承受的风险程度及其他因素，并适当地寻求独立的财务及专业意见。一国政治风险作为其主权信用风险的一部分，并不等同于其主权信用风险。

² 根据 2015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相关表述，“一带一路”倡议包括 64 个国家。截至 2018 年 8 月，已有 103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 118 份“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协议。

展望 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印度、乌克兰等多国均将举行大选，政策不确定性将有所升高；巴以僵局将很有可能持续，沙特和伊朗等中东大国出于争夺地缘优势或缓解安全焦虑等目的竞相介入地区冲突与热点问题，在叙利亚、也门等地继续展开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印度与巴基斯坦、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地区紧张局势得到缓解的可能性较小。总体看，2019 年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仍存在集中爆发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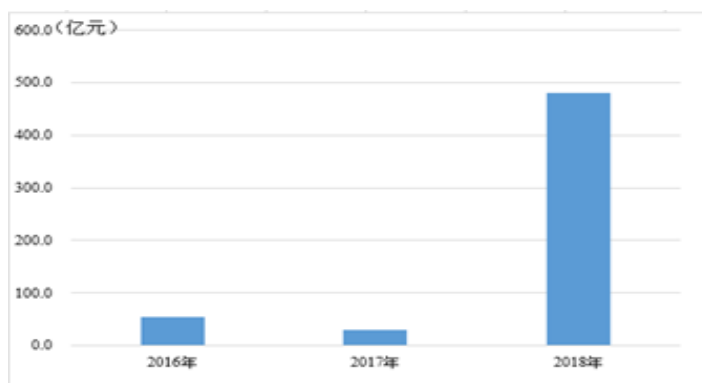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研究背景

中国债市双向开放加快，“一带一路”相关投资渠道增多，企业参与“走出去”合作成果显著，但沿线国家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风险，令各类投资者面临潜在损失

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已走过五周年，为中国债券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提供了重要舞台。继 2017 年中国首次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2019 年 4 月 25 日中国又迎来了第二届高峰论坛的召开，“一带一路”建设有望持续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国内债务资本市场支持“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环境逐渐成熟，“债券通”开通近两年以来，共有 500 余家境外主体通过其参与到中国债券市场，融入“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发展机遇。同时，国内债券市场支持“一带一路”制度安排也日趋完善：2017 年 10 月 27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计划（2018~2020）》；2018 年 3 月 2 日，中国证监会对外发布了《关于开展“一带一路”债券³试点的通知》，拓宽了“一带一路”建设直接融资渠道，进一步推动了境内资本市场双向开放。2018 年以来，国内、外各类主体发行的“一带一路”债券出现爆发式增长，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及主权熊猫债券规模达到 479.7 亿元。中国债市的双向开放为国内投资者提供了更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渠道。

图 1 近三年“一带一路”（类）债券发行规模



数据来源：Wind

注：统计口径为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与主权熊猫债券规模。

³ “一带一路”债券主要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府类机构在本所发行的政府债券；“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企业及金融机构在本所发行的公司债券以及境内外企业在本所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司债券。

同时，近年来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不断增长。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投资环境、优化能源结构等刚性需求较大，其投资潜力巨大，尤其是在能源、铁路、公路、港口、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走出去”的大潮中。2018 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5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8.9%。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893.3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52%。对于我国参与境外投资的企业来讲，参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有利于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尤其是对我国部分民营企业来讲，更是实现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的难得机遇。

但另一方面，从境外的情况看，“一带一路”建设涉及 60 余个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周边市场，途径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东欧、独联体及非洲等多个地区。沿线国家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政府治理能力较差，社会安全形势严峻，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盘根错节，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漩涡，政府不合理征收、汇兑限制等问题频发，政治风险尤为显著。政治风险因具有“难以控制、难以制止”的特性，且影响力大、辐射面广，往往对各类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潜在损失。因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风险的程度进行界定、分析和量化评估，对于金融投资者以及企业投资决策而言，均提供了关联性较强的指导。

二、政治风险因素分析

政治风险是指一国发生的政局与安全形势变化，或一国与其他国家关系发生的变化对投资者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一国政治风险包含内部及外部两大类，具体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局稳定性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由于政治制度的脆弱性、军队干政、政党纷争、社会矛盾尖锐、政策连续性较差等原因，部分国家政局稳定性风险较大。例如独联体区域的乌克兰，由于亲欧派与亲俄派政治角力激烈，公众对政府支持度低，政治局势纷繁复杂，克里米亚危机后乌克兰东部地区武装冲突持续爆发，地区局势动荡，对政治稳定性持续形成拖累。近年土耳其政局稳定性同样堪忧，2018 年埃尔多安突然提前大选并连任，导致权力进一步集中，腐败丑闻频发，政策的可预见性大幅降低，政局稳定性进一步恶化。东南亚的巴基斯坦、缅甸均有军队干政的历史，执政党与反对派政见分歧严重，引发各方支持者抗议示威频发。东南亚部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及可预期性低，如缅甸等国中央与地方政策一致性较差，政策制定往往在各种政治势力博弈中摇摆不定，也是其政局稳定性较差的原因之一。非洲国家虽然大都建立了形式上的选举制度，但由于政治制度的脆弱性，更是几乎“逢选必乱”。

（2）政府治理风险

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府治理风险尤为突出，打击腐败和提升行政效率方面收效尚不明显。为打击腐败，过去几年间，缅甸、尼泊尔等国家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并成立

大大小小的反贪腐委员会，负责全国的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但效果仍较为有限。如缅甸新政府上台后加强了对贿赂与贪污行为的打击力度，规定公务员不得收取价值超过 2.5 万缅甸币的赠礼，每年收取的赠礼总值不得超过 10 万缅甸币等，并出台了鼓励民众举报涉贪官员的举措。虽然政府反腐措施呈现出一定的成效，但缅甸的腐败问题依然严重。目前贪污腐败依旧是大部分亚太地区和独联体地区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3）社会安全风险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看，中东北非等地区仍是国际恐怖活动的重灾区与策源地。同时，由于地理上接近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大本营阿富汗，国内穆斯林数量众多，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交织宗教、民族等历史渊源和特殊地形因素，东南亚及南亚多国恐怖主义及分离势力盛行，社会安全风险尤其突出。例如，南亚的巴基斯坦一直深陷恐怖主义的泥沼。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美国在阿富汗发动反恐行动后，阿富汗塔利班逃往巴基斯坦边境俾路支等地区，并逐步加深了对巴基斯坦其他地区的扩散。同时，作为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国内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宗教极端主义势力频繁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国内经济及投资环境受安全形势影响严重。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印度、尼泊尔等国，由于“圣战”残余势力作为“伊斯兰国”的存续力量回流，边境地区防线薄弱等，也成为恐怖主义新的活跃区域。

（4）政府管制风险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分析，独联体区域，尤其是中亚五国中，由于多呈现“威权”强人型政治体制，政策管控力度相对较大，在金融市场、贸易及投资领域的限制性规定往往较多。如乌兹别克斯坦名义上实行经常项目外汇自由兑换，但实际操作中对外汇管制十分严格。在 2017 年以前，乌兹别克斯坦对企业入账外汇仅允许 50% 提现，另 50% 必须卖给乌兹别克斯坦央行，且不得随意提取。在乌兹别克斯坦外资企业经常遇到资金结汇难的问题。乌兹别克斯坦企业、银行因“调汇”问题拖欠中国企业债务的情况时有发生。南亚部分国家，如尼泊尔，在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也较多，对其投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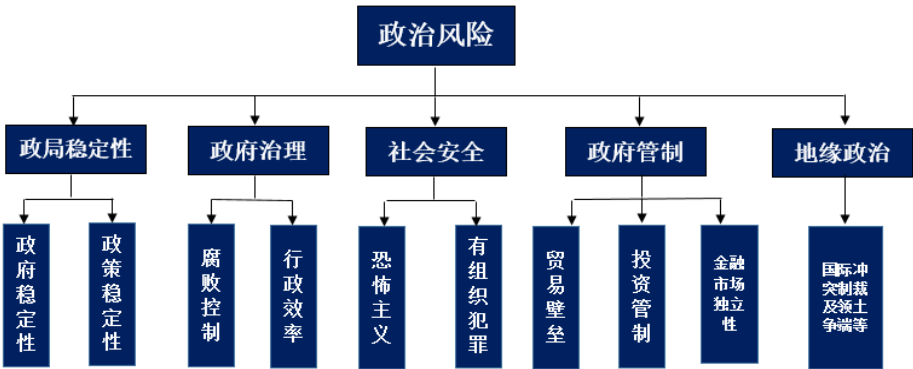
（5）地缘政治风险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印巴冲突、俄乌冲突以及巴以冲突等都已经持续了多年，军事冲突时有发生，导致这些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近年来，中东地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呈现高度阵营化及冷战化态势，大国之间争锋带来的地缘政治争夺明显加剧。目前中东地区形成了以美国、沙特和以色列为核心的反伊朗联盟，对伊朗重启制裁，伊朗在地区热点问题等方面积极反击，双方对抗升级将进一步恶化中东地区局势；土耳其和俄罗斯也通过设立海外军事据地、扩大安全合作等方式积极提升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以争夺地区领导权。国内战争与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一直居高不下，产油国内部矛盾和相互间的争夺也严重冲击了自身的经济增长。

三、“一带一路”政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前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主要因素的分析，我们建立了以政局稳定性、政府治理、社会安全、政府管制和地缘政治五大因素为框架的政治风险评价体系。在此框架下，利用前期研究和数据成果，选取合计 10 个二级指标。指标评价体系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综合五大因素表现，对“一带一路”沿线 50 个国家的政治风险程度进行量化评估，政治风险评价体系框架及指标如下图所示（具体指标来源请参考文末附表）。

图 2 政治风险评价框架



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在指标体系的指导下，经过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和一致化处理后，对各因素进行综合打分，等权重加权后得到综合得分。各分项指标得分范围均为 0~100 分，得分越高，表明风险越低。最终，综合专家意见调整等评价依据，将政治风险划分为很高、较高、中等、较低和很低五个等级。评估规则如下表所示。

政治风险表现评估规则					
得分	>80	80~70	70~55	55~45	<=45
风险评价	很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很高

(1) 政局稳定性风险

政治稳定性主要考量执政主体被暴力等手段动摇或推翻的可能性，其引发的风险包括执政主体执政能力弱化、缺乏调动内部资源的能力等。政治环境或执政主体的稳定是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一般从政府稳定性和政策可预期性两方面来衡量。政局稳定性风险得分与评估规则如下：

政局稳定性评估规则					
得分	>75	75~65	65~45	45~30	<=30
风险评价	很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很高

(2) 政府治理风险

政府治理能力是对一国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状况的评价，主要从政府对腐败问题的控制以及政府的办公效率这两个方面来衡量。腐败控制指对私行使公共权力的程度，包括各种类型的腐败，以及精英阶层、官员或私人对国家利益的“占取”。透明程度高、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的政府体系在腐败控制方面通常表现较好；存在严重腐败问题的政府，其经济发展、政府财政状况必定会受到较大负面影响，执政稳定性也较差。政府效率是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政府行政部门独立程度、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质量以及政府对相关政策做出的承诺可信度的综合评价。一个高效的政府在提供公众服务、政策制定和执行、公共财政管理等方面成效显著，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政府治理风险得分与评估规则如下：

政府治理评估规则					
得分	>80	80~60	60~40	40~25	<=25
风险评价	很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很高

(3) 社会安全风险

社会安全是指东道国由于恐怖主义、暴力、内乱、破坏等因素造成的国内安全形势恶化，从而引发财产损失等的风险，多与意识形态、民族矛盾和宗教因素引发的冲突相关。恐怖主义是社会、宗教、民族和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多发于国际或国内政治社会转型时期。在由乱到治或由治到乱的转型阶段，都有可能滋生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社会安全风险状况得分与评估规则如下：

社会安全评估规则					
得分	>80	80~70	70~50	50~40	<=40
风险评价	很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很高

(4) 政府管制风险

政府管制风险考察一国金融市场、投资以及贸易方面的独立性及自由度方面的风险程度，主要衡量央行独立性、金融监管政策执行是否受干扰，是否存在不合理的政府征收风险（包括没收及国有化）、是否存在资本管制、汇兑限制措施以及过度的贸易壁垒等方面。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和干预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损害商业和投资信心，进而对一国政治稳定形成负面拖累。政府管制风险状况得分与评估规则如下：

政府管制评估规则					
得分	>70	70~60	60~50	50~35	<=35
风险评价	很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很高

(5) 地缘政治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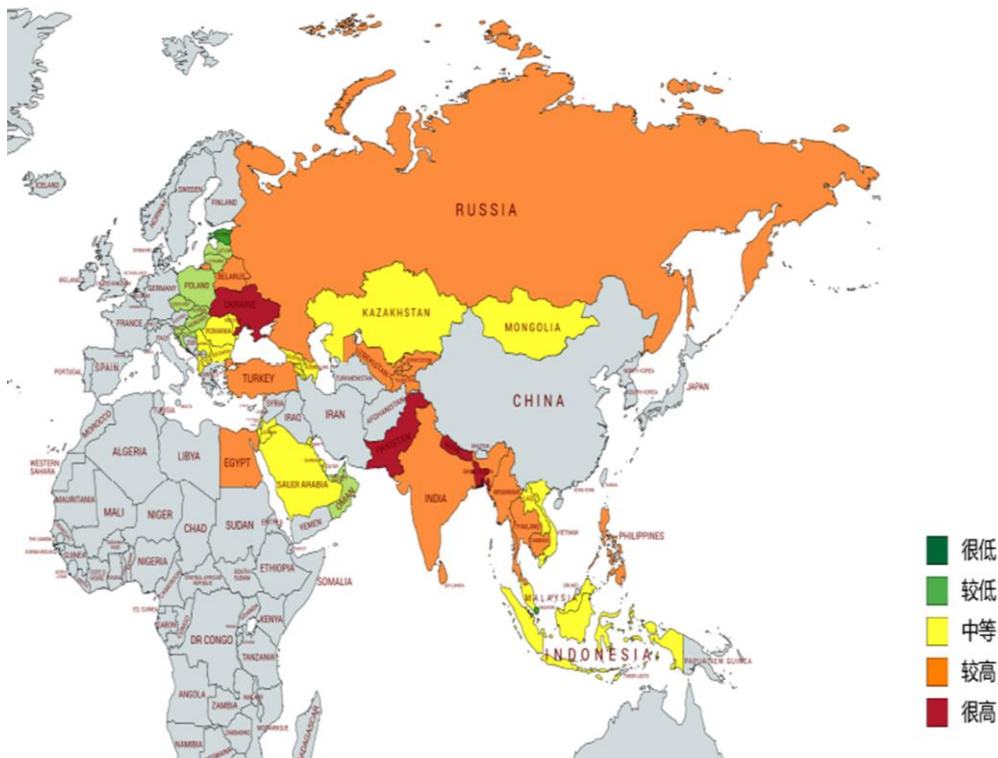
地缘政治风险指的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上是否与他国存在政治冲突或者被国际社会制裁等国际地位受到不稳定因素威胁的情况，或者一国与其相邻国家是否存在领土争端等方面的风险。该因素主要利用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和平指数相关指标表现以及专家意见来综合评价，地缘政治风险得分与评估规则如下：

地缘政治评估规则					
得分	>83	83~76	76~70	70~62	<=62
风险评价	很低	较低	中等	较高	很高

四、政治风险评价结果解读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 50 个重点国家政治风险的评价，根据量化指标体系的打分规则，得出了“一带一路”50 国政治风险的评价结果（见下图）。下文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独联体、亚太、中东北非、东欧四个地区，并结合得分对其政治风险分别进行归纳与解读。

图 3 “一带一路”沿线 50 国政治风险地图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一）独联体地区——政治风险最高，地缘形势紧张，政府管制与治理风险显著

表 1 11 个独联体地区国家政治风险指标表现

国家	政局稳定性	政府治理	社会安全	政府管制	地缘政治	总风险
格鲁吉亚	42.50	74.76	81.23	79.53	71.75	69.96
哈萨克斯坦	50.04	36.78	72.70	60.00	75.75	59.05
亚美尼亚	32.64	41.35	76.35	75.27	67.75	58.67
阿塞拜疆	40.35	32.46	81.05	64.87	63.75	56.49
摩尔多瓦	35.21	27.64	78.01	61.00	76.50	55.67
吉尔吉斯斯坦	34.47	18.03	67.56	62.87	70.50	50.69
白俄罗斯	36.69	43.27	57.50	38.80	72.25	49.70
乌兹别克斯坦	34.05	22.36	82.31	27.53	71.50	47.55
塔吉克斯坦	41.33	10.34	68.75	42.87	68.25	46.31
俄罗斯	33.24	33.90	54.65	45.93	62.50	46.04
乌克兰	18.03	28.61	44.97	46.67	47.25	37.11

注：表中所列为各国政治风险各分项得分（100 分满分，分数越高风险越低）。深红色代表政治风险“很高”、橙色代表政治风险“较高”，黄色代表政治风险“中等”，浅绿色代表政治风险“较低”，深绿色代表政治风险“很低”，以下同。

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独联体地区平均政治风险得分为 52.48，总体政治风险在四大区域中最高。独联体地区 11 国中，政治风险处于“较高”和“很高”区间的占比超过半数，区域中各国政治风险普遍偏高。分国别看，乌克兰政治风险处于最高区间；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 5 个国家政治风险较高。

乌克兰的 5 个分项指标中 2 个处于“很高”风险区间，3 个处于“较高”风险水平。政局方面，近年来乌克兰亲欧派与亲俄派政治角力激烈，公众对政府支持度低，政策摇摆不定令各项社会改革进展缓慢，对政治稳定性形成拖累。从地缘政治看，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急剧恶化。2018 年底，乌克兰与俄罗斯在亚速湾等地持续爆发军事冲突，乌俄关系陷入冰点，地区局势动荡对政治稳定性继续形成拖累。从政府治理看，乌克兰腐败现象严重，任人唯亲、收受贿赂现象较为严重，对政府执政能力造成损害。从社会安全看，克里米亚危机后乌克兰东部地区武装冲突持续爆发，地区局势动荡，暴力事件频发。

俄罗斯 5 个分项指标中 4 项处于“较高”区间。地缘政治、政府治理和政府管制等风险突出。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和欧盟均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令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不断恶化。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俄关系一度出现融冰迹象，但随着美国的“通俄门”调查以及在乌克兰与叙利亚等问题上的对立，美俄关系又再度降温至“新冷战形式”的对峙。俄罗斯与乌克兰在东部顿巴斯地区以及亚速湾等地持续爆发冲突，也导致俄罗斯地缘政治形势严峻。此外，虽然俄罗斯一直强化行政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但国内滥用职权、官僚主义、权贵垄断、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严重。仅 2017 年前 9 个月，俄罗斯就有超过 1.3 万人被卷入腐败犯罪，其中上千人在行政或立法机构任职，150 多人为联邦机构官员。

中亚五国中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政治风险总体均“较高”。中亚五国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处在俄罗斯、中国、南亚之间，临近中东“火药桶”阿富汗，在欧亚大陆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其外交策略往往在追求均势的同时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摇摆不定。另一方面，作为独立于中东与俄罗斯的另一个能源基地，该地区的能源一直是大国博弈的对象，加大了地缘政治风险。政府治理方面，由于政权高度集中，裙带风、小集团利益、权力寻租等现象严重，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腐败与行政效率问题尤其突出。虽然各国政府致力于推行反腐立法，设立专门机构应对腐败问题，但由于总统集权制的弊端，收效并不显著。而政府管制方面，由于总统权力的高度集中，对经济领域的干涉也相对较多如乌兹别克斯坦名义上实行经常项目外汇自由兑换，但实际操作中对外汇管制十分严格。在 2017 年以前，乌兹别克斯坦对企业入账外汇仅允许 50% 提现，另 50% 必须卖给乌兹别克斯坦央行，且不得随意提取。在乌兹别克斯坦外资企业经常遇到资金结汇难的问题。

从本地区其他国家情况看，摩尔多瓦政坛亲欧派与亲俄派斗争激烈，政局稳定性较差，同时存在腐败、任人唯亲等问题，政府治理风险高，对其整体政治风险形成拖累。阿塞拜疆与邻国亚美尼亚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领土争端长期敌对，小规模冲突不断，给阿塞拜疆及亚美尼亚带来一定的地缘政治风险。格鲁吉亚同样位处地缘政治要塞，2003 年“玫瑰革命”

后，政治路线转向亲西方，“去俄化”政策明显，为争夺原格鲁吉亚自治州南奥塞梯控制权，俄格曾爆发战争。但由于俄格双方放弃武力解决承诺及欧盟、美国约束，再次爆发大规模公开战争的可能性较小，地缘政治风险有所平抑。

（二）亚太地区——多种政治风险并存，国家间表现分化

表 2 15 个亚太地区国家政治风险指标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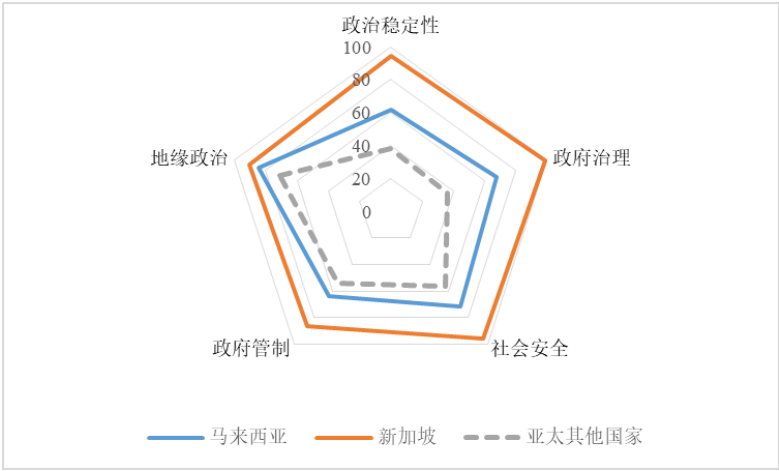
国家	政局稳定性	政府治理	社会安全	政府管制	地缘政治	总风险
新加坡	94.50	98.80	95.55	86.60	90.50	93.19
马来西亚	61.58	67.31	72.03	64.00	84.50	69.88
蒙古	52.93	42.07	83.79	61.93	79.50	64.05
越南	53.14	42.31	78.02	49.73	77.25	60.09
印度尼西亚	45.41	51.45	54.72	61.60	78.75	58.39
老挝	56.55	27.17	72.82	45.60	79.50	56.33
柬埔寨	46.78	17.07	76.81	58.47	72.50	54.32
斯里兰卡	39.18	44.72	59.39	52.07	72.50	53.57
泰国	32.19	54.81	46.07	66.00	68.50	53.51
印度	39.27	52.65	40.83	50.80	62.50	49.21
菲律宾	36.69	45.91	37.32	66.07	62.25	47.63
缅甸	23.33	22.84	52.92	63.82	67.50	46.08
孟加拉国	25.69	20.68	49.27	46.20	67.50	41.93
尼泊尔	36.57	21.16	49.42	33.47	73.75	40.87
巴基斯坦	24.63	26.93	32.05	53.27	48.00	36.98

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总体来看，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中，亚太地区平均政治风险得分为 55.07，政治风险仅次于独联体地区。亚太区域国家的政治风险表现出一定的分化趋势。

新加坡政治稳定性高居榜首，人民党自 1959 年上台以来长期执政，并奉行宗教多元化与族群包容和谐政策，政局高度稳定，鲜见政治暴力的发生。马来西亚的总体政治风险也较低。而南亚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如印度、缅甸、菲律宾、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政治风险则处于“较高”或“很高”区间。在地缘政治、社会安全、政府治理和政局稳定性等方面的政治风险都较地区其他国家突出。

图 4 新加坡、马来西亚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政治风险分项对比



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由于长时间的军事对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风险突出。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冲突几乎从未中断。同时，印度和巴基斯坦境内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成为影响国内安全形势的主要威胁。印度独立后，国内宗教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宗教对立所导致的仇恨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近年来，受阿富汗战争的影响，巴基斯坦作为反恐前沿国家安全形势一直不佳。尽管政府已针对卡拉奇和联邦管辖部落区域的暴力和恐怖主义进行武装镇压并削弱了武装分子力量，但中期内预计巴基斯坦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较难在短期内有根本性转变。此外，巴基斯坦国内还一直存在着民选政府不稳定以及腐败泛滥等诸多问题。自建国以来，只有很少几届民选政府实现了平稳过度交接政权。作为“巴基斯坦民族保护者”，军方在对抗印度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一直在巴基斯坦政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缅甸来看，虽然全国民主联盟上台执政结束了缅甸持续了半世纪的军政统治时代，但缅甸军事集团仍是决定缅甸政治走向的最重要因素。缅甸军方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对抗以及由民族矛盾引发的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持续军事冲突、宗教矛盾等问题也一直严重影响着缅甸的政局稳定性。缅甸是亚洲国家中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存在大量的民族矛盾和地区分裂势力，国内安全环境非常恶劣。2017 年 8 月，150 名罗兴亚救世军叛乱分子向缅甸若开邦的 24 个警察哨所和第 552 轻步兵营营地发动协同袭击，缅甸军方在若开邦展开血腥镇压行动，迫使数 70 多万的罗兴亚人纷纷出逃。缅甸政府也因此饱受国际舆论压力。此外，缅甸的贪腐问题严重，曾是全球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在过去数十年的军政府执政时期，上至政府高层，下至基层公务员，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缅甸新政府上台后，开始着手打击贪腐现象，但效果不甚显著，腐败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改善。

近年来菲律宾内部冲突不断，饱受南部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及相关武装组织的困扰，并多次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导致菲律宾的地缘政治风险较高、国内社会安全环境也较差。孟加拉国

境内与极端组织有关的暴力事件和恐怖袭击也明显增多，严重影响着国内安全性及政局稳定性。虽然孟加拉国政府积极打击恐怖主义组织以维持社会稳定，但随着 2019 年大选临近，国内关于民生问题抗议愈发增多，对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多年来，由于党派斗争激烈，尼泊尔国内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虽然随着新宪法的正式落地和新政府的成立，尼泊尔政局进入了平稳过渡期，但仍然面临国内党派众多、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现状。从地理位置来看，尼泊尔在东南西三面被印度包围，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严重依赖印度（尼泊尔与印度的贸易占到了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60% 以上）。在地缘上受印度钳制大大增加了尼泊尔的地缘政治风险。2015 年，由于印度不满尼泊尔通过新宪法，两国关系出现恶化。印度随后对尼泊尔实施了长达 5 个月的贸易封锁，导致从印度输入的生活必需品供给量锐减并爆发严重的燃油危机。此外，由于在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等方面的限制较多，尼泊尔存在很高的政府管制风险。尼泊尔的平均应用关税为 12.3%，明显高于地区平均水平（5.4%）。同时尼泊尔也是严格的外汇管制国家，大额用汇须经央行审批。虽然近年来政府不断修改外资法案以改善投资环境，尼泊尔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中央集权政策一直严重拖累着其贸易和投资活动。

（三）中东北非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突出，社会安全环境较差

表 3 10 个中东北非地区国家政治风险指标表现

国家	政局稳定性	政府治理	社会安全	政府管制	地缘政治	总风险
阿联酋	72.14	86.54	90.36	61.47	71.25	76.35
阿曼	71.72	62.50	94.94	70.67	75.50	75.07
卡塔尔	68.86	75.48	89.71	67.73	47.50	69.86
以色列	36.70	84.62	60.80	76.47	56.00	62.91
巴林	43.63	56.01	70.71	79.60	64.00	62.79
约旦	37.42	60.82	67.70	70.47	72.50	61.78
科威特	46.05	45.67	68.73	64.67	72.25	59.47
沙特阿拉伯	46.00	64.19	61.83	57.00	64.50	58.70
土耳其	34.72	52.41	43.44	69.87	52.50	48.59
埃及	38.06	31.73	48.82	60.60	59.25	45.69

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中东北非地区平均政治风险得分为 62.12，总体政治风险在四大区域中位列第三。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风险主要集中在政局稳定性以及地缘政治风险方面，从国别来看，中东北非地区的“一带一路”国家中，土耳其、埃及等国的政治风险尤为突出。

2016 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未遂事件以后，埃尔多安对反对势力进行了有力打压并通过修改宪法使自身权力进一步集中。在 2018 年大选中，虽然埃尔多安以 52.5% 的选票顺利当选总统，

但在同期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埃尔多安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和在野党民族行动党组成的“人民联盟”仅赢得 600 个席位中的 342 席，未能夺得 360 席的绝对多数，因此土耳其国内的反对势力依然会对埃尔多安今后的执政造成一定程度的掣肘。阿拉伯之春以后，埃及的政局稳定性虽有所改善，但国内反恐形势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恐怖袭击时有发生。同时，近两年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使得民众怨声载道，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有所增加，埃及国内形势仍有变差的可能。

中东地区一直是美、俄等域外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主战场，除此之外，出于教派分歧、安全冲突以及争夺地区霸主等原因，中东地区多国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由于卡塔尔与土耳其、伊朗关系密切，2017 年 6 月，沙特、埃及、巴林等 6 国陆续宣布与卡塔尔断交，沙特还计划在靠近卡塔尔边界 1 公里的沙特境内开凿一条长 60 公里的运河，将三面环海一面与沙特为邻的卡塔尔完全与陆地隔离，进而孤立卡塔尔。和解无果后，卡塔尔对沙特等国的态度也开始趋于强硬，除从美英法意俄等国进口大量军火、不断加强军备外，2018 年 5 月，卡塔尔首次对沙特等国商品下达禁令，并在 2018 年底宣布退出欧佩克组织。目前双方对峙已经持续一年有余，但仍无和解迹象。

目前，中东地区以沙特、伊朗和土耳其为核心形成了对抗阵营。在美国的支持下，沙特对外强势“反伊朗”、深度介入叙利亚局势，并加大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伊朗则竭力维持对自身有利的地缘政治态势，不断巩固什叶派阵营，利用断交风波进一步拉拢逊尼派国家卡塔尔和土耳其，进而扩大地区影响力。土耳其方面，叙利亚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势力不断壮大，是土耳其最担忧的问题之一。近年来围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问题、卡塔尔断交危机、卡舒吉遇害等事件，土耳其与沙特的矛盾不断加剧。进入 2018 年以来，由于美国启动对土耳其的制裁以及提高土耳其的钢铝进口关税而引发土耳其经济全面恶化，两国关系迅速降至冰点。以色列方面，为强化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一直以来在巴以问题上美国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2018 年 5 月，美国不顾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强烈反对，执意举行了将其驻以色列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到耶路撒冷的仪式，从而诱发了 2014 年以来巴以最血腥的暴力冲突。2019 年，巴以僵局将很有可能持续，中东地区持续动荡。

（四）东欧地区——政治风险显著低于其他区域

表 4 14 个东欧地区国家政治风险指标表现

国家	政局稳定性	政府治理	社会安全	政府管制	地缘政治	总风险
爱沙尼亚	67.44	85.34	92.29	82.00	80.00	81.76
捷克共和国	63.47	75.96	82.94	82.00	90.50	78.97
斯洛文尼亚	60.21	81.98	87.52	68.67	90.00	77.68
立陶宛	56.91	75.24	88.90	78.67	81.25	76.19
拉脱维亚	50.97	74.28	83.44	77.00	82.75	73.69

斯洛伐克	55.50	68.75	80.92	77.00	85.75	73.58
匈牙利	53.53	64.66	81.18	78.67	86.75	72.96
波兰	47.51	75.00	80.37	78.67	81.75	72.66
克罗地亚	49.76	66.83	82.36	73.67	84.00	71.32
保加利亚	48.35	57.45	71.98	72.00	84.00	66.76
罗马尼亚	40.25	50.72	82.60	68.67	85.00	65.45
阿尔巴尼亚	52.25	49.04	70.82	75.93	78.75	65.36
塞尔维亚	46.08	51.93	75.02	65.67	78.75	63.49
马其顿	34.82	51.68	65.23	69.00	73.50	58.85

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东欧地区平均政治风险得分为 71.34，整体政治风险相对最低。东欧地区 14 国的政治风险均处于“中等”及以下区间，显示该区域在政治风险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其他地区。

从各国情况看，本地区位于巴尔干半岛的马其顿、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政治风险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其中，马其顿政治风险较为突出。2017 年 5 月，扎埃夫就任马其顿总理，结束了长达 6 个月的无政府政治僵局，马其顿政局有所企稳，但近年马其顿执政党与反对党矛盾激烈，选举中曾多次引发示威及暴力活动，政局及政策稳定性较差，且腐败问题严重，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升。另外马其顿国内存在阿尔巴尼亚族与马其顿族民族矛盾尖锐，阿族极端分子多次袭击马其顿政府军，令国内安全风险进一步上升。此外，巴尔干半岛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素有“欧洲火药库”之称，冲突及矛盾集中。马其顿由于能源等问题深陷西方、土耳其等地缘政治漩涡，地缘政治风险较高，均推升了其整体政治风险。

图 5 巴尔干半岛国家分布



数据来源：公开渠道，联合资信整理

虽然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由于科索沃问题及民族历史矛盾沉淀，仍存在一定的地缘政治和社会安全风险，但出于加入欧盟的考虑，目前两方保持了相对克制的态度，目前风险大幅缓和，已降至较低。同时，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政府治理能力

较差，主要是由于腐败问题严重拖累。为满足加入欧盟的要求，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近年来持续加大对官员腐败和经济领域犯罪的调查和打击力度，如塞尔维亚政府出台了国家反腐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作为各执法部门重要而具体的反腐指导手册；为打击公共采购领域中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2018 年保加利亚通过反腐败法案，重点打击政界高层贪腐。这些措施的出台为打击腐败提供了指导，但实际效果仍不及预期。

尽管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等部分国家也存在议会政党碎片化等政治稳定性方面的问题，但东欧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高，各国执政党普遍拥有亲商、开放的政策共识，在经济增长向好的背景下，各国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普遍较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民族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俄罗斯族与本土民族之间，但总体安全形势仍较为平稳，暴力及恐怖主义威胁较小。爱沙尼亚、捷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克罗地亚等多国整体政治风险均处于很低或较低区间。

五、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展望

展望 2019 年，一方面，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将继续面临着国内政局不稳定的风险。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乌克兰等国家都将于 2019 年举行大选。长期以来，乌克兰缺乏持久的政治稳定局面，国内分裂动乱，乌克兰东部局势持续动荡。在即将举行的 2019 年总统大选中，共有 44 人获准登记成为总统候选人，创下乌克兰总统选举候选人数量的历史新高，是对乌克兰各派政治力量的一次重大考验。

另一方面，正在进行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教内部派别之间的矛盾不太可能在近期内得到解决。中东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并很可能在 2019 年继续保持这种状态。从目前来看，2019 年，巴以僵局将很有可能持续，美国所酝酿的“世纪协议”将耶路撒冷问题、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和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排除在谈判之外，因此很难被巴勒斯坦方所认同和接受。从以色列方来看，除了巴以问题，2019 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战争风险。目前伊朗在不断尝试加强其在叙利亚的存在，并同时进一步加大力度不断投入武装力量到黎巴嫩直接与以色列对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发出警告称绝不会接受伊朗在叙利亚建立永久性的军事基地或在黎巴嫩和叙利亚建立导弹工厂，若伊朗继续其扩张行为，战争或将不可避免。出于争夺地缘优势或缓解安全焦虑等目的，沙特和伊朗等中东大国均以教派为动员工具竞相介入地区冲突与热点问题，在叙利亚、也门等地展开了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其他国家也纷纷以教派划线和站队，教派矛盾高度政治化。

从其他地区来看，2019 年初，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了自 2001 年以来最严重的对抗事件，使得原已紧张的印巴关系变得更加剑拔弩张。印巴关系复杂，特别是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双方均难以做出较大让步，预计短期内两国关系难有实质性改善。作为南亚的两个大国，印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必然会引发地区局势震荡。自 2018 年底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刻赤海峡“擦枪走火”以来，黑海和亚速海水域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从俄罗斯方面看，俄方在克里米亚问题

上不会让步，欲获得对克里米亚的永久控制权。俄乌两国立场尖锐对立，彻底和解的可能性不大。总体来看，2019 年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仍存在集中爆发的可能。